

# 个人、国家与世界： 近代中国公民教育中的外交知识传播

赫佳妮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的公民教材在讲述外交知识时,个体、国家、世界三者的关系是其核心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国内理想主义情绪高涨,民族主义也日渐炽热,公民教材将个体视为“人类一份子”,在“国家公民”的基础上,力图培育服务于人类共同福祉的“世界公民”。随着国民革命浪潮的蔓延和国民党党义的灌输,学习国际常识逐渐成为培养“三民主义革命公民”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具备外交知识的合格公民,首先应该是能够利用三民主义武装自身、忠于国民党党义精神、服从领导、遵守纪律的集体中的一员。民国时期的公民教材在向民众讲述“外交”的同时,也利用外交知识生产和传播塑造中国的国内社会。这既揭示民国公民教育的国际维度,也说明“外交”作为一种教育资源和知识工具的国内政治价值。

---

\* 赫佳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邮编:1000871)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外交 近代中国 公民教育 世界主义 国家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席卷全球的公开外交浪潮下,普通民众的参与成为外交实践的显著特征。大众的参与丰富了现代外交的内涵,但也加深了外交精英的担忧。如何培育并规训大众力量成为外交精英无法回避的议题。在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公民教育进入学校课堂,有关外交的知识就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公民教材讲述外交知识时,个体、国家、世界三者的关系是其核心议题。引导个体走出家庭,在更宽广的社会关系中定位自身,并承担对国家、对世界、乃至对人类的责任与义务,成为公民教育的关键目标。

民国公民教育中的外交知识传播涉及两方面议题,即国民外交与公民教育。学界对国民参与外交的历史有丰富的研究。无论是对中国国民外交概念诞生与实践历史的讨论,还是从全球史视角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众意见对外交事务的影响,其基本共识在于国际政治的复杂现实与残酷的世界大战唤起了民众对国际事务与国家前途的关注,这改变了公民监督或参与政府外交的方式,在程序意义上重塑了国内公众与政府外交的关系。<sup>①</sup>更重要的是,外交知识也可以成为一种思想武器,直接参与培育公民的认知。<sup>②</sup>通过公民教材讲述外交知识正是在精神层面上塑造整个国内社会的文化和自我认知的方式之一。有关民国公民教育的研究认为,公民教育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蓬勃兴起,至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推广党义教育(或称“三民主义”教育)时衰

---

<sup>①</sup> 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曾荣:《近代中国“国民外交”的渊源流变》,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12—381页;Daniel Hucker, *Public Opinion and Twentieth-Century Diplomacy: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New York, NY: Bloomsbury Academic, An Imprint of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20. Christina la Cour, “The Evolution of the ‘Public’ in Diplomacy,”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Vol.14, 2018, pp. 22-35.

<sup>②</sup> 有关外交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的作用,参见赫佳妮:《战争、革命与中国现代外交叙事形成的形成:基于20世纪30年代外交知识类图书的考察》,《外交评论》2023年第2期,第76—103页。

落。即便 1932 年公民课程再次回归学校，但它也已名存实亡、风光不再。<sup>①</sup>

这条线索大致勾勒出了民国时期学校公民教育的起落兴衰。将国民党党义教育的侵入视为割裂学校公民教育之举，固然从形式上反映了公民课程的走向。但是，就公民教育实质而言，党义精神指挥下的公民教育“衰落”并不意味着其停止塑造个体、国家、世界的关联。事实上，诸多学者已经指出革命政党的思想和实践持续影响着民国塑造的公民内涵及其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sup>②</sup>因此，党义教育并非导致塑造公民对个体、国家、世界关系认知这一进程的断裂，而是在彼时的内外环境下成为重塑个体、国家、世界关系的新的纽带，讲述外交知识正是它发挥作用的载体和工具。本文以民国时期出版的公民教材为依托，探讨外交作为一种知识工具和教育资源对于社会重塑的内向型价值，希望以此深化公民教育研究，弥合学界对民国时期国民外交研究与公民教育研究之间的分野。

相比于一一般的大众读物，公民教材作为叙述和传播外交知识的载体有其独特性。<sup>③</sup>首先，学校教材的编纂须与官方话语保持一致，其发行须经教育部审定，通常配有详尽的官方教案。一方面，这意味着教材展现了各政权不同时期的政治主张、教育重点及其变化；另一方面，即便在思想和社会现实激烈变革的时代，作为在学校普遍应用的教学载体，教材往往排除了过于激进或过于

---

① 毕苑：《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以公民教科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0 年卷），第 299—320 页；陆一爽：《论民国公民教育的起源与变迁》，《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 年第 3 期，第 23—31 页；毕苑：《从〈修身〉到〈公民〉：近代教科书中的国民塑形》，《教育学报》2005 年第 1 期，第 90—95 页；陈华：《中国公民教育的诞生：课程史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刘霞：《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

②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Yeh Wen-Hsin,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0;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赫佳妮：《战争、革命与中国现代外交叙事的形成：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外交知识类图书的考察》，《外交评论》2023 年第 2 期，第 94—101 页。

③ 有关大众知识读物介绍外交知识的特点，参见赫佳妮：《战争、革命与中国现代外交叙事的形成：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外交知识类图书的考察》，第 76—103 页。

保守的观点,秉持了更加持中、温和的叙事态度。<sup>①</sup>

编写公民教材作者自身的立场和观点也影响了教材的叙事。在民国时期,这些作者群体是多样的,但概括而言,专业性和政治性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一方面,在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领域有建树的学者为早期公民教材的编纂提供了严谨专业的知识背景。例如,周鲠生一直从事国际法学和政治学的教学科研;舒新城致力于教育学研究、教育改革和图书出版事业。<sup>②</sup>另一方面,诸多教材编写者也同国民政府、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教材作者与政界的关联成为更普遍的现象。当时影响最为广泛的公民教材之一《初中公民》直接由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伦和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编写。这些教材内容自然反映了国民政府政策的指导及国民党党义精神的渗透。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教材的读者群是各年龄段的普通学生。他们既不是学有所成的专业人士,也不是政府公务人员。所以,相较于学术专著,学校教材中的“专业”知识往往更加浅显平实;相较于政府文件或党务报告,教材中的思想宣教与课业知识相伴进行、须适应不同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简言之,公民教材介绍外交知识构成了一种平衡激进与守旧、兼顾知识性与政治性、适应普通学生的叙事。

本文从这些公民教材出发,探讨20世纪20—40年代的公民教材如何利用外交知识的规范化教学塑造学生对于个体、国家、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并由此定义何谓合格的公民。具体而言,本文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北伐战争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日本侵华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等四个阶段,讨论公民教材讲授外交知识的叙事逻辑及其塑造的个体、国家、世界的关系的演变,从而分析合格公民的定义标准如何在国际、国内现实中变迁。

---

<sup>①</sup> Peter Zarrow, *Educating China: Knowledge, Society, and Textbooks in a Modernizing World, 1902-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7.

<sup>②</sup> 徐强、刘新生:《舒新城日记选录(一)》,《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4页。

## 一、从个体修养到社会一员：进入公民课程的外交知识

在公民教育中讨论外交问题是自然而然的。在晚清民初知识界的争论中，公民的定义及其“合格的”标准几经变革、并无定论<sup>①</sup>，但基本围绕将个体融入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展开。在中国日益卷入世界事务的背景下，有关个体应如何在中外关系以及世界中自处的知识，自然成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在晚清民初的修身课程中，培养学生“爱众亲仁”的情感、“爱同类之知识”<sup>②</sup>、“一身与家族、朋类、国家、世界之关系”<sup>③</sup>、“对社会对国家之责任，以激发进取之志气，养成爱群爱国之精神”<sup>④</sup>就是其宗旨。20世纪20年代初，在教育界有关修改学制的讨论中，诸多学者建议取消修身一科，增设公民课程，以利于开展更广泛的社会改良。由此，学校修身教育开始向系统的公民知识教育转型。<sup>⑤</sup>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吴研因指出，公民一科“不是代表旧日的‘修身科’”，而是要“使学生明白自己与社会的关系”。<sup>⑥</sup>程湘帆在《新教育》上发表的《公民教育之宗旨与目标》一文更清楚地阐述了他对公民教育的宗旨的理解，即“以‘德谟克拉西’的原则，造就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人类忠勇服务的明达公民”。<sup>⑦</sup>简言之，学校教育中的公民课程意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维度中探讨个体在其中的位置与责任。

1922年，教育部确立“壬戌学制”，并组织编写新的学科纲要。1923年6

---

① Robert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429页。

③ 《奏定中学堂章程》，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02页。

④ 《教育部订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451页。

⑤ Zarrow, *Educating China*, pp. 101-108.

⑥ 吴研因：《教育通论：新学制小学课程纲要（吴研因先生在上海中华暑期学校演讲）》，何伟如记，《中华基督教育》1923年第2期，第13页。

⑦ 程湘帆：《公民教育之宗旨与目标》，《新教育》1922年第3期，第398—399页。

月,分别由杨贤江、周鲠生等人编写的小学 and 初中各科目纲要和高中各科目总纲发布。<sup>①</sup> 依照小学公民课程纲要,在家庭、本乡、国家的基础上,学生从第四学年开始就需要接触“国际的关系”方面的相关知识。高级小学毕业的最低标准要求学生不仅知晓国家及公民责任,而且要明白“国际的情势”和公民对“国际的重要责任”。<sup>②</sup> 初级中学要求学生在公民课程中的学习内容包括从家庭至世界六个层面,即家庭及其组织、宪政原则、中华民国的组织、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国际关系。具体而言,“国际关系”部分包含两方面要点:一方面,从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视角出发,学生须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国防、外交机关设置及其职能的知识;另一方面,学生须关注普遍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准则及国际现实,诸如国际道义与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领事裁判权、租借与租界、势力范围及外国驻兵等问题,并了解重要的国际组织及其职能,如海牙仲裁法庭、万国联盟、常设国际法院等。<sup>③</sup>

由此,公民教育不再囿于个体修养和忠于君上的思想桎梏中阐述其对文明礼貌、修行卫生、处事规范等方面要求,而是将其同更广泛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乃至同整个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如周之淦、杨中明、卢殿仪在其仿照美国的《公民学课程大纲》编制的课纲中所述,要培养“有求知社会现象、群众关系及世界国家疑难问题之习惯”的公民,“如外交问题、统一问题、社会问题等皆为处此社会、处此国家之公民不可不了解者”。<sup>④</sup> 如何在层层递进延伸的社会关系中定位个体,找寻个体相互关联建立起来的网络边界,并处理不同层级网络之间的关系,成为公民教育的主要议题。学习个体之“外”的知识成为必须,与外交相关的知识也自然而然成为公民课程的必修内容。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次会议提出新学制课程标准,在小学和初中课程中,公民课

---

①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之缘起》,《河南教育公报》1923年第15—17期合刊,第3页。

② 同上书,第16、18页。

③ 周鲠生:《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初级中学公民学课程纲要》,《河南教育公报》1923年第15—17期合刊,第1—6页。

④ 周之淦等:《公民学课程大纲》(上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5页。

程已经取代修身课程，同卫生、历史、地理同属社会科。<sup>①</sup> 由此，教育界掀起了第一波公民课程教材编写和出版的高潮，讲授新的公民理念。

## 二、作为“人类一份子”的“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对“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及对建立国联的期待，充斥于知识界有关世界与中国前途命运的讨论中。梁启超、李大钊等人都曾从各自视角出发对此寄予厚望。梁启超认为，中国几乎“举国一致”地“热望此同盟之成立”。在他看来，即便欧洲人更专注于其国家利益、认为国际同盟的设想过于高远，中国自古所强调的“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使其向来追求超越国家层次之上的目标，也即天下大同的目标。如其所言，“我中国人之思想谓政治之为物，非以一国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此种广博的世界主义是我数千年来政治论之中坚也”。他援引中国春秋时代的历史说明，把国内的“民约的精神扩而大之”至国家之间，使各国在保持其国家现状基础上，“相互间发生种种共同利害，其关系愈密接，则其必须共守之规律亦日增”，久而久之，国家之间的“畛域之见渐泯，驯至成为一体”。在梁启超看来，要实现这种理想的“人类全体大结合共同活动”的“大同主义”，战后建立国际同盟是“最良之手段”。<sup>②</sup> 三个月后，李大钊在《新潮》上发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认为在“解放的时代”，人类进化都是朝着“世界大同”的方向前进，这也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李大钊的设想是一个“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的“世界大同”，对可能由和平会议演变而来的“世界议会”、由“仲裁裁判”演变而成的“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以及“世界行政机关”构成的“世界联合政府”充满期待。<sup>③</sup> 梁启超、李大钊的观点是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对世界主义认识的缩影。他们的

① 朱经农：《讲演录：新学制课程（附表）》，《新教育》1923年第2—3期，第399、403页。

② 梁启超：《国际同盟与中国》，《国民公报》1918年12月8日，第2版。

③ 李大钊：《联治政府与世界组织》，《新潮》1919年第2期，第152、155页。

表达既彰显了各自相异的知识脉络和政治主张,也反映了对世界大同理想的普遍热情。

在诸多新出版的公民教材中,1923年,由舒新城主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部,并在此后多次修订再版。该书虚构了一个普通初中公民课堂,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了教员讲授、师生讨论的课堂场景,由此将公民知识要点娓娓道来。该书第五编为“国际关系”,在第十九章“国际关系之维持”的开篇就指出,国家间关系的维持应与个人交往相同,须以道义为凭、增进相互理解,从而消弭战争与欺压。<sup>①</sup>因此,学生应抛弃“狭义的爱国主义”,不论对方来自哪个国家,也不论他国与中国是否有过往仇怨,“凡我对于人类应有的道德,决不因其系某国国民而有所变异”。<sup>②</sup>

推而广之,以人类个体之间的情感关联为基础阐述世界和平的根基成为这一时期诸多公民教材的思路。周之淦等人在《公民学课程大纲》中由此讲述个人为推动“国际协作”应负有的责任。其一,个人应该透彻明了战争与和平的意义,要以消灭战争、推进和平为己任;其二,因为文明的进步,人类互相依赖的增强,人类合作的必要性也愈来愈突出;其三,交通的发达以及人类交际的频繁,使和平变得更加必要。具体而言,学生可以多参与各领域有关世界事务的讨论。例如,探讨“宗教及劳工运动与国际协作之关系”“‘世界语’之价值”“将来国际真正协作时是否应有同一的语言”等问题。学生也应该多参与非政府间协会,从而增进民众间了解。例如,万国妇女参政同盟会、议员协会、报业协会及各种学术研究会等。<sup>③</sup>在1926年出版的《公民纲要》中,孙祖基借用了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定义“模范公民”的责任,他同时重新解释了“平天下”的含义,即“培养国际同情”。<sup>④</sup>

据此,公民教材也重新定义“礼貌”对待外国人的意义。礼貌不仅是个人

---

① 舒新城:《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第3册,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21—22页。

② 同上书,第78—79页。

③ 周之淦等:《公民学课程大纲》(下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66—167页。

④ 孙祖基:《公民纲要》,上海:青年协会书报部1926年版,第2—3页。

品德修养问题，而且成为联结人类社会、促进合作、避免冲突的纽带。诸多教材强调，需要国民注意“国际道德规范”、了解“外国人于居留国有国际法上相当的地位”，避免“缺乏外交常识”的行为，免受“文明各国所轻贱”。<sup>①</sup>这是因为公民培育的目标在于“要替世界造成适当的人物”，造就“国际间的国民”，而非“本国的一个国民”。<sup>②</sup>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的公民学教材展现了对世界主义议题的巨大热情，但这并未驱使它们否认国家的存在。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多次在宣讲三民主义思想时批评世界主义思想，认为中国不宜提倡。<sup>③</sup>在公民学教育知识体系的早期建构中，国家仍然是构成世界的基础单元。高阳、陶汇曾甚至在其公民课本中放弃使用“世界主义”，而是追求“以国家之巩固为前提，以国与国之间共存共荣为目的”的“国际主义”的理想状态。<sup>④</sup>在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看似矛盾的关系中，世界主义并没有迫使“国家”离场，而是为国家的追求披上了更宏大的和平愿景。例如，在舒新城介绍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上要求废止租借地的立场时，他着重说明“中国代表团非特为中国利益计，且为各国利益计，为远东和平计”。<sup>⑤</sup>192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小学教科书公民课本》则提出更完整的表达，倡导在世界与人类的发展全局之中审视国家兴盛的意义，即国家不仅要寻求政治和经济的独立以“增进自己的幸福”，而且“该协助友邦，以维持全世界的和平，增进全人类的幸福”。<sup>⑥</sup>

因此，与其以抛弃国家为代价追求世界大同，公民教材更强调同时作为国家与人类一份子的个人既应维护国家，也应以实现世界和平为最终目标。例如，顾树森和潘文安在《新著公民须知（道德篇）》中所言，“我们的爱国，一面不

① 顾树森、潘文安：《新著公民须知（道德篇）》，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61—62页。

② 同上书，第61页；庄适：《新法语教科书》第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45页。

③ 桑兵：《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78—80页。

④ 高阳、陶汇曾：《新撰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初版（1926年再版），第100—102页。这里的“国际主义”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国际主义并非同义。

⑤ 舒新城：《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第3册，第18页。

⑥ 朱文叔：《新小学教科书公民》第4册，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版，第21—22页。

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将来各国的趋势,都是如此,我们提倡主义的作用,也是为此”。<sup>①</sup>

概言之,20世纪20年代初,公民教材的第一波出版浪潮修正了晚清民初修身课程只关注臣民或公民自身素质的视角,强调个体不仅从属于国家,更是世界和人类中的一员,服务于世界和人类的福祉。如王仲和、金崇如、冯顺伯所著《初中公民学教本》所言,“现代的公民教育已由国家的进为国际的”。<sup>②</sup>然而,在这个从个体延伸至全人类的理想图景中,国家并未完全隐身。如徐国琦所说,在1895年至1914年间,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新方式是世界主义,但是,国家主义是它的基石和底色。<sup>③</sup>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共存与竞争延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二者“在规则维度的共时并存”成为中国各界知识精英在探讨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背景。<sup>④</sup>在早期公民课本中,国家主义的现实与世界主义的追求同行,国家既是叙事的基本单元线索,也呼应世界主义的精神号召。

### 三、以“国民革命”之名重塑个体的公民责任

早期公民教材中宣扬的世界大同境界、借鉴个人道义准则处理国家间关系,以及基于人与人彼此互通的情感关联维护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福祉等内容无疑是迷人的。但是,这对研究公民问题的学者、课程教员、学生和普通民众而言,却是他们未曾亲身见证的理想境界。正如沈艾娣在探讨民国初期的公民培育时所说,北京政府在国内社会创造了一系列象征自由、民主、平等的政

---

① 顾树森、潘文安:《新著公民须知(道德篇)》,第58—59页。

② 王仲和等:《初中公民学教本》第2编,南京: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1924年版,第180页。

③ Xu Guoqi, “The Age of Innocenc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p. 91.

④ 陈廷湘:《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抗与共存》,《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期,第133页。

治符号,这为民众塑造了一个他们从未经历过、也并不存在的虚拟世界。<sup>①</sup> 在这个虚幻的平台上所建构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理想平衡同样是脆弱的。1926年,国共合作联合北伐。中国国民党发布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否定了在帝国主义剥削、国内军阀压迫的环境中,通过构建个体、国家、世界之间和谐一致的积极关系实现世界大同理想的可能。<sup>②</sup> 在北伐革命军横扫中国的现实中,疾风骤雨式的暴力运动、高度集中且等级森严的军事组织、追求完胜的革命目标迅速占领了公民教育的宣传阵地,各类公民教材成为国民党宣传其革命纲领的话语表达平台。

自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起,新出版的公民教材在描绘世界现实时,着意凸显大国与弱小国家在不平等世界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引导学生认识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差距及其影响。前文所述的王仲和、金崇如、冯顺伯所著的《初中公民学教本》第三版于1926年发行。初版介绍国民参与外交需具备的“最低限度”的知识时仅提及三项内容,即“世界外交的趋势”“中国外交的现状”“外国于居留国有国际法的相当地位”,并将世界大势与国际法规范置于首要位置。<sup>③</sup> 第三版在介绍国民应具备的“最低限度”的国际知识时,提及五项内容,包括“世界各大国地理的位置及政治经济等状况”“世界弱小民族反抗运动的状况”“各国军备及政党的状况”“各项国际组织的状况及本国的地位”“各种新政策新主义的内容及活动的状况”。在此基础上,该书删除了初版小结中所谈到的“以恳挚真诚为交际,以光明坦白待友邦,以公理正义为凭依”<sup>④</sup>等内容,而是紧随其后附上“不平等条约简表”,说明中国在领土、赔款、路权、领事裁判权等方面的“损失”。<sup>⑤</sup> 简言之,所谓“世界”不再是每一个体应为之和平而努力的理想憧憬,转而成为各国相互竞争较量、压迫与抗争、侵略与

---

①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 85.

② 《中国国民党为出师北伐宣言》,《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特别党部月刊》1926年第5期,第28页。

③ 王仲和等:《初中公民学教本》,第193页。

④ 同上。

⑤ 王仲和等:《初中公民学教本》第2册,南京: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1926年版,第84页。

反侵略的角力场。

在涉及不平等条约的议题上,这种对比则更加强烈。早期的公民课本虽也谈及不平等条约,但对应该如何处理普遍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例如,1925年由基督教青年会主编的“公民教育丛刊”中的《不平等条约讨论大纲》开宗明义指出,“修约”和“废约”两种主张“各有是非,请留待诸君讨论”<sup>①</sup>,并分别提供从国际法角度分析条约概念和义务的材料及国民党宣扬废约的号召,供学生开放讨论。

但是,20世纪20年代下半叶出版的公民课本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逐渐清晰。教材在控诉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鲜明地主张“废约”,并且详细列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时间、中国损失的权利种类及具体损失情况概要<sup>②</sup>,由此启发学生在纷争的国际局势中维护国家利益,知耻而后勇,在列强环伺的压迫中努力抗争。同时,在公民教材讲授“不平等条约”时,也多不再解释其法理基础、辨析修订和废除的区别与利弊,而是强调应“特别说明不平等条约的弊害”。<sup>③</sup>舒新城的公民课本在1929年改版,第十八章标题由原先的“国际不平等的关系”修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指出“废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可能的。<sup>④</sup>

在“不平等”的世界现实面前,以人类个体相通的情感维系的国家道义是无力的。只有革命才能彻底改造国家间不平等的关系,公民的首要责任也是参加革命。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上,军队广泛散发提前印制的宣传单、口号标语、小册子、旗帜、孙中山画像和遗嘱等,希望以此激励民众、传递革命信念,扩大国民革命的社会影响。<sup>⑤</sup>公民教材也不断以北伐军的行军胜利事迹取代原本与世界大同理想、人类共同命运相关的内容。诸如“从军救国”“行军有纪律”“爱国男儿”“坚忍”等主题成为公民教科书中常见的内容,并教导学生只有如北伐军一般严格遵守纪律、坚定地服从统一领导才能取得成功。在“国有外

① 孙祖基:《不平等条约讨论大纲》,第1—2页。

② 王仲和等:《初中公民学教本》第2册,第84—85页。

③ 赵复、胡钟瑞:《复兴公民教学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0页。

④ 舒新城:《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第3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19—20页。

⑤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 185.

患”时，这是百姓的责任。<sup>①</sup> 王仲和等在新版教材中也强调，确定的对外目标和一致的外交意识可以帮助国民外交实现“枪法不乱，步调整齐，才可应付”。<sup>②</sup> 随着“枪法”“步调”“应阵”等描述军队作战的词汇被移植到有关外交知识的讲述中，公民教材不再沉浸于讲述仰赖个体间的共同道义和情感追求人类福祉，而是塑造了一个同军事战场一样的“外交战场”。每一个参与国民外交的公民不再是以“人类一分子”的个体身份追求世界和平，而首先是外交战场上严格听指挥、服从命令、有明确且彻底的抗争精神的、整齐划一的革命组织中的一员，在统一的领导下集体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改变国家命运。

#### 四、国民党的“党义教育”

在北伐战争渲染的革命和军事氛围下，国民党在 1928—1931 年间大力推行的“党义教育”，将国民党党义凌驾于公民教育之上。三民主义、国民党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迅速在各科目中渗透。<sup>③</sup> 同时，中央民众训练部也将这些内容定为党义教师资格审查的考试内容。<sup>④</sup> 1928 年，国民政府将党化教育命名为“三民主义”教育。<sup>⑤</sup> 7 月，国民政府颁布条例要求各级学校除了要在各科教学时融入党义精神外，须增加专门的党义课程。<sup>⑥</sup> 8 月，教育部将“三民主义”一科改为“党义教育”，并取消了公民学科，公民知识的教学完全由党义科目取

---

① 陆绍昌、刘传厚：《新中华公民课本》第 5 册，上海：新国民图书舍 1931 年版，第 10—16 页；闻吉甫等：《新中华公民课本教授书》第 5 册，上海：新国民图书舍 1930 年版，第 28、33 页。

② 王仲和等：《初中公民学教本》第 2 册，第 83 页。

③ Zarrow, *Educating China*, p. 113.

④ 《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的检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条例》（1928 年 6 月 30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72—1075 页。

⑤ 《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关于白崇禧提议实行三民主义化教育案致国民政府代电》（1928 年 7 月 28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第 1073—1075 页。

⑥ 《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条例》（1928 年 7 月 30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第 1073—1075 页。

代。<sup>①</sup>此外,中央训练部通知上海及南京各书局将出版的党义相关书籍呈送审查。<sup>②</sup>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国民党实现了对学校课程体系和行政的全面控制,将党义灌输其中。<sup>③</sup>

在党义教育的指挥棒下,“帝国主义者的压迫”“革命外交”“不平等条约”“国际组织”等“国际常识”仍是初高中课程的教学内容。<sup>④</sup>但是,如初、高中《学程纲要》所示,其最终目标并不是带领学生客观地认识世界现实,而是假借学习“国际常识”之名,为国民党一党培植拥趸。如初中《学程纲要》在叙述教学目的时所言,该科是为了使学生“略知三民主义,及为主义牺牲之战士,养成三民主义的健全公民,担负革命建设的工作”。<sup>⑤</sup>以前文多次提及的舒新城所著公民课本为例,该书1929年再次改版,在原书多处增加了直接宣扬国民党党义的内容。例如,初版教材在谈及“外交失败”后,告诫民众“不要凭一时的义愤,随便乱动”,并鼓励其增进对世界事务的了解。<sup>⑥</sup>1929年版教材则直接落脚在贯彻国民党政策、研习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上。<sup>⑦</sup>

概言之,在形式上,党义精神对公民教育的全面覆盖并未抹去个体与世界的关联,而是强调三民主义所倡导的新的“大同之治”,以及“革命公民”应负有的责任。诸如“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组建三民主义的国际”“三民主义与救世界”等内容仍是公民学课程的重点内容。<sup>⑧</sup>但实质上,所谓公民教育中的“国际常识”已沦为国民党一党操控的工具。师生们对此怨声载道、敷衍了事。虽然

① 毕苑:《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以公民教科书为中心》,第313—314页。

② 《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通知各书局(店)须将党义书籍送审函》(1928年4—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第1110—1112页。

③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pp. 167-182.

④ 《初中三民主义公民学学程纲要》,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教务处编:《社会学科学程纲要》,上海: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教务处1929年版,第3页;《高中三民主义公民学学程纲要》,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教务处编:《社会学科学程纲要》,第2页。

⑤ 《初中三民主义公民学学程纲要》,第1页。

⑥ 舒新城:《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第3册,第10页。

⑦ 同上。

⑧ 《高中三民主义公民学学程纲要》,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教务处编:《社会学科学程纲要》,第1—2页。

国民政府力图赋予党义课程极关键的政治地位，但它在教育系统中存续时间并不长久。1932年，教育部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将其中的“党义”一科改为“公民训练”。<sup>①</sup>在1932—1934年间，在教育部的指令下，在中小学教学体系中几近消失的公民课程再次回归。<sup>②</sup>从教育部颁布的《小学公民训练标准》和《中学公民课程标准》来看，国民党党义的精神仍然在事实上主宰着公民课程的内容设计。<sup>③</sup>

在社会影响最广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系列教科书和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初中公民》中，三民主义革命思想都贯彻其中。供高等小学使用的《复兴公民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即要求学生背诵总理遗嘱全文。<sup>④</sup>由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叶楚伦和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编写的《初中公民》也将党义化倾向融入战时国民政府的公民教育之中。<sup>⑤</sup>该书完全按照教育部颁布的“革命建设之程序”编排章节，旨在国家之“艰难”和国际背景之“险恶”的时刻培育“热血之青年”。<sup>⑥</sup>1935年出版的《徐氏公民》则更具体区分了不同职业的公民为废除“只有义务而无对等权利的‘卖身契’”时，应在党义之下承担的责任——官员应“以十二分的至诚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军官士兵应有“真正救国救民的大志”，教育界的人应“认清教育救国的意义”，青年们“应该做的复仇雪耻的工夫，就是在训练自己的身心，用战士拼命杀贼的精神，努力学习，锻炼身体，修养道德，造成守纪律重秩序的习惯”等。<sup>⑦</sup>

公民教材也着重营造更加“革命”的教学氛围。利用有关外交的知识在学校“造成革命化的环境”成为公民教育的教学方法之一。<sup>⑧</sup>具体而言，学校须将

① 朱元懋：《建国教科书初中公民教学参考书》，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2页。

② 《国民政府文官处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等单位关于中小学党义课程归并各科改称“公民”课的往来文件》（1932年8月至1933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第1090—1096页。

③ 同上。

④ 赵景源、魏志澄：《复兴公民教科书》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页。

⑤ 毕苑：《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以公民教科书为中心》，第318页。

⑥ 叶楚伦、陈立夫主编：《初中公民》第2册，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版，例言，第1—2页。

⑦ 同上书，第66页。

⑧ 朱元懋：《建国教科书初中公民教学参考书》，第4页。

学生目之所及之处布满革命的宣传要素,如悬挂各种国耻表、民族运动史事图、不平等条约表、国民革命军北伐图等,张贴“中国已到生死关头,只有积极抵抗,才是生路”“服从领袖,严守纪律”等标语,悬挂革命伟人和民族英雄照片等。<sup>①</sup>

从2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北伐革命军的力量席卷中国、建立国民政府,国民党革命外交思想和实践渐渐深入面向公众的外交知识表达中。早期公民教材中的世界大同理想、人类自然友好的愿望已经被军事斗争、激愤、党义、纪律、服从等要素取代。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党义的影响更加直接。通晓外交知识的健全公民应该忠于三民主义,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以三民主义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拯救国家命运的武器,并努力将三民主义革命拓展至更多的被压迫民族,进而改变世界。个体对社会、国家、世界乃至全人类的责任是嫁接在三民主义思想之上的。在此背景下,在公民教材中讲授有关“外交”的知识,其目的并非引导学生掌握外交的职业技能或者培养专业思维,而是通过定义“外交”的方式、目标、手段来培育学生忠诚于国民党的意志,塑造学生服务党国的思想。正如建国系列教科书的编者朱元懋所说,世界各国的公民教育都有其主义的,比如,意大利以法西斯主义为指导进行公民教育,苏联以社会主义为指导,日本以忠君爱国主义为指导。既然中国是三民主义国家,那么,其公民学就应该是“三民主义公民学”,养成“三民主义国家忠勇服务的公民”。<sup>②</sup>

## 五、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民党“三民主义拯救世界”的愿景

日本侵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蔓延使以国民党党义为主线的公民教育塑造的个体、国家、世界关系有了更迫切的任务导向。首先,在日本侵

---

<sup>①</sup> 朱元懋:《建国教科书初中公民教学参考书》,第4—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3页。

略的严峻形势下，公民个体的首要责任是投身于挽救国家命运的民族事业之中；其次，随着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推进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三民主义的大同理想”再次浮现。公民的个体责任被同时置于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及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宏观框架之中。具体而言，在这个新的“世界联合”之中，“三民主义革命公民”更应展现“大国民”的风采，既与美、苏、英等国家公民平等，也勇于为被殖民、被压迫的弱小国家发声。

### （一）战时忧虑与“外交”的失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华使国民政府面临的局势更加危急。公民教材对于依靠国际合作改变中国命运的态度渐趋失望，普遍认为“国际联盟的威信和《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同受莫大的损失”。<sup>①</sup> 国联“为少数国家所利用”“组织脆弱不具实力”<sup>②</sup>，“无力惩治侵略国”“非可依赖”。<sup>③</sup> 尽管如此，这些教材也强调退出国联等国际组织并非明智之选。如《初中公民》所说，退出国联属于“感情用事”，因为如果中国留在国联之内，尚可以获得“道德的援助”；退出国联，反而不利于中国争取自身利益。<sup>④</sup> 这种“有限度”的认可更能代表此时公民教材对国际组织的态度。一方面，这些国际组织已经丧失早期公民教材所渲染的它们是为世界和平计、以实现人类共同利益为目标的理想形象；另一方面，公民教材并未号召公众与之决裂，因为中国仍然可以争取道义支持，发挥“国际”平台的价值。

公民教科书对国际组织及培育世界公民的失望态度进而演化为对运用外交手段改变中国命运的怀疑。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系列教科书再版。在日军全面侵华的背景中，它对“外交”的态度更加消极，直言“要是不用兵力，而用外交，我国还要亡得更快，只要各国外交官坐在一处，各人签了字就

---

① 孙伯睿：《复兴初级中学公民课本》第2册，第32页。另见赵复、胡钟瑞：《复兴公民教学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90页。

② 徐逸樵：《徐氏初中公民》，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26—29页。

③ 钱安毅：《初中公民》第2册，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98页。

④ 同上书，第98页。

完了”。<sup>①</sup>在此语境之中,外交的价值不仅远不及军事,而且被视为是一种可被随意操弄的伎俩。更甚者,再版系列教科书已经不再提及中国应如何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改变国家境遇,删除了有关“和平”“世界”“我们是世界的公民”“拥护公理”等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国家、民族、民众集体力量恢复民族地位,如“明了民族地位的危險”“具备明确的民族意识”“树立坚强的民族自信力”“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和知能”“迎头赶上外国的科学”。<sup>②</sup>

在战时国家前途的整体忧虑之中,公民教材明晰了公民与世界的关系,即在中国沦为孙中山所言的“次殖民地”的“奇耻大辱”中,每一个公民应该作为国民党党义指导之下的一份子融入集体抗争,形成一股坚定团结的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和地位,改变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受欺侮压迫的现状。复兴系列公民课本将这种个体、国家、世界的关系描述得更为具体——中国人须“成一个很坚固的团体,使四万万人之有一条心,合力去争民族的自由,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只有这样,“个人的自由才能保得住”。<sup>③</sup>孙中山有关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讨论仍是这一时期公民教科书常引用的材料。中国作为“受屈民族”应以世界主义为“最高理想”“最后目标”,但仍要先实现“复兴民族”。<sup>④</sup>尽管世界主义并没有完全从公民教育中退场,但是,它已经让位于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首要任务。在复兴系列教科书中,有关“世界公民”的介绍也在逐渐淡化。它仍然关注世界上不同国家的联系,提及“我们不但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而且是全世界的公民了”。<sup>⑤</sup>但是,具体而言,有关如何做一个“世界的公民”,书中则没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了。

---

① 宗亮襄等:《复兴公民教科书》第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13页。

② 同上书,第14—16页。

③ 赵景源、魏志澄:《复兴公民教科书》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6页。

④ 同上书,第108—109页。

⑤ 赵景源、魏志澄:《复兴公民教科书》第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42页。另见赵复、胡钟瑞:《复兴公民教学法》,第188页。

## （二）联合的意义

尽管“外交”的意义在公民教育中渐趋模糊，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将中国的抗战塑造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座孤岛。国民政府的公民外交知识教育也同时在更广泛的“世界联合”的维度下，讨论中国在日本侵略下的遭遇，重新构建民众对世界战争局势的关注。随着抗战深入，国民政府积极争取苏联和美国等大国的军事援助，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的关注与同情。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播音教育委员会发行的《战时公民常识》专门用一章分析通过“抗战外交”获取英、美、法、苏等国对中国抗战同情和援助的意义。<sup>①</sup>此后不久，欧洲、苏联、美国相继卷入对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作战中。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宣言》，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的抗日战场乃至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战场越来越受到盟国的关注。<sup>②</sup>

1942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中苏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孙科在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第四届年会上发表题为《今后国民外交的工作》的演讲，强调国民外交应重视“对内宣传与教育的工作”。<sup>③</sup>孙科具体分析了威胁世界和平的两股势力——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指出在世界大战中的中国公民，不仅要知晓战争是为了消除日本的威胁，而且“其他的帝国主义也要使它绝迹”。更重要的是，孙科也在讲演中引导民众从更广泛的地理空间审视帝国主义的全球威胁。中国不仅要追求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要实现亚洲的韩国、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等国都能摆脱殖民压迫、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的“持久”和平才真正有可能到来。<sup>④</sup>

① 俞汝朋：《战时公民常识》，汉口：教育部播音教育委员会1938年版，第57—67页。

② 近来，“全球二战”这一概念越来越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旨在将原本只关注欧洲战场的研究视野拓展至亚洲、非洲、拉美等地。不仅关注战场上的军事活动，而且关注与此相关的社会动员、文化活动、卫生医疗、饥荒、自然灾害、女性群体等一系列社会议题，参见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③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53页。

④ 同上书，第57—58页。

但是，“世界联合”的号召隐含着内在冲突。英美等国既是中国的盟国，也是此前的公民教材激烈批判的在华占有广泛殖民利益的帝国主义国家。孙科并未回避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他指出，即使中国在面对这些同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同盟国时，也要“光明磊落”地提出实现民族解放、建立独立国家的主张，只有这样才能“使和平得到永久的保障”<sup>①</sup>；另一方面，他也强调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对民族独立与自由的共同追求。他援引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广播演说中提到的，“世界上假使有一个民族不能获得自由，假使有一个国家受侵略，那就是我们得不到自由，我们自己受到侵略”<sup>②</sup>，用以说明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也为友邦所接受和宣扬。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双重身份中隐含的冲突，影射了早期公民教育中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主义情怀。

有关“世界大同”“人类正义”的语词也一度回归到公民教材之中。<sup>③</sup> 在1940年修订的初级中学公民课程标准中，“公民与世界”仍然是公民课程教学的内容之一，包括“对于国际”“对于人类”“对于万物”三个部分。然而，在国民党党义指导下为国家奋斗牺牲的精神仍在公民教育中占据至高地位。1943年初版、1946年再版的《中等学校公民科教材及其教学法》提出，公民教育要“使全国人民具有国家民族之观念”“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牺牲之感情与行为”，使人人可以谋求“国族之强盛”“世界大同之实现的手段”。<sup>④</sup> 在具体说明不同部分的讲授分配时，该书也明确指出，“训练‘国家的公民’较训练‘世界的公民’为重要”。<sup>⑤</sup> 对“大同”概念的解释也仍然以国民党党义教育精神为基础。公民课本在讲解何谓“世界大同”时，一方面，提示要参考《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另一方面，则强调须遵循《总理全书提要》中说明的“三民主

①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57—58页。

② 同上书，第58页。

③ 袁公为：《中等学校公民科教材及其教学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9—30页；国立编译馆：《初级中学公民》第1册，上海：大中国图书局、新亚书店、广益书局、北新书局、中联印刷公司1948年版，第10页；国立编译馆：《初级中学公民》，上海：世界书局1947年版，第109页；钱安毅：《高中公民》，贵阳：交通书局1942年版，第18—19页。

④ 袁公为：《中等学校公民科教材及其教学法》，第3页。

⑤ 同上书，第171页。

义的大同理想”。<sup>①</sup> 公民课本在介绍“反侵略国家联合”及“世界和平”的宗旨时，也往往将其融入国民党党义的训诫中。如 1948 年面世的第 32 版《高级小学公民课本》在讲解国民党近时的主义和政策时，概括介绍了 1938 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其中，第一条为“在国际外交方面，本独立自主的精神，联合世界上反侵略的国家，共同奋斗，以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恢复和平正义的世界”，这是帮助学生理解教材所宣称的“国民党真不愧为现代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的依据之一。<sup>②</sup> 概言之，此时公民课本中的所谓“世界大同”，更是三民主义指导下的“大同”。

### （三）大国公民的再造

更进一步而言，在这个再次回归到“联合”的世界叙事中，中国既不是美、苏、英等大国亦步亦趋的追随者，也不再是缺乏国际号召力的弱小国家。虽然中国同其他弱小民族同处于追求民族独立、废除帝国主义的同一战线上，但是，地位却与其他亚洲殖民地国家不同。在孙科看来，由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艰苦卓绝地付出，中国已经是“反侵略四大柱石之一”，处于“亚洲的领导地位上”。中国不仅有资格，而且应该“帮亚洲的民族说话”。只有保持亚洲的和平，才能保证世界的和平，这是中国抗战以来“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sup>③</sup> 因此，尽管国民党党义教育仍然强调孙中山对“次殖民地”的定义，但是，在抗战中后期的公民外交知识培育中已经更加强调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引领作用。

1943 年，国民政府分别同美国和英国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和《关于取消英国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的条约》。民国公民教育中的“大国”认知倾向更加明显。1945 年，抗战胜利，中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并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战

---

<sup>①</sup> 袁公为：《中等学校公民科教材及其教学法》，第 172 页。另参见教育部：《初级中学公民》第 3 册，第 108—110 页。

<sup>②</sup> 国立编译馆：《高级小学公民课本》第 3 册，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版，第 5 页。

<sup>③</sup>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第 58 页。

后出版和再版的公民课本中已将中国视为世界“五强”之一。<sup>①</sup>同时,战后公民教材也号召普通民众“学习欧美的长处”,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发展上的优势,从而可以“使我国达到名实相符的强国地位”。这与“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和“恢复固有道德”一并构成战后“弘扬民族主义”的方法。<sup>②</sup>

在公民教育中普及外交知识的目的逐步演变为培养大国公民在战后和平时期进行友好的日常对外交往时应有的良好精神风貌。194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公民训练目标》,将“启发儿童关于人民权责”“人类亲爱”“国际合作”等观念列入公民训练的教学任务之中。<sup>③</sup>中华民国外交部和教育部合编了《国民对外交际常识》,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培育民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与外国人士进行友好平等的交往。正如该书序言所述,“今我政府已与英美各国分别签订平等互惠之新约,国家已获得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此后全国人民,应淬砺奋发,自强不息,务使言行悉达国际最高之标准,维持我礼义之邦之风度。”<sup>④</sup>为此,该书着重介绍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应对同外国民众在不同友好情境下进行日常交往,诸如鞠躬、握手、脱帽的礼仪,让位、次序规范等,拜访的时间、名片使用,宴会的席次安排、席间礼貌、敬语,不同场合应着何种服装等,希望读者学会一种“使对方乐于接近”“不使见者增加不快”的“交际之道”<sup>⑤</sup>,但同时也“须注意于谈吐中万勿感情从事,畅所欲言,甚或泄露国防军事等重要机密”。<sup>⑥</sup>由此,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培养公民日常行为规范,宣传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现实和国民政府取得的成就,希望公民能够在中国获取国际平等地位之后呈现新的精神面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的公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迎来了“世界”维

---

① 国立编译馆:《初级中学公民》第1册,第8页。

② 同上书,第8—10页;国立编译馆:《初级中学公民》第2册,上海: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1948年版,第15页。

③ 《教育通讯》,1948年第6期,第31页。

④ 外交部、教育部编:《国民对外交际常识》,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5年版,第1页。

⑤ 同上书,第3页。

⑥ 同上书,第50页。

度的回归。但是，国民党党义也赋予了“世界大同”思想新的战时内涵，学习三民主义指导下的“世界大同”成为帮助学生理解国民政府战时“革命外交”的重要手段。在这个新的“世界”观念之中，公民应该认识到中国具有多重身份。一方面，它同亚洲其他弱小国家一样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压迫、法西斯主义威胁；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战牺牲也奠定了它作为亚洲领导者的身份。在战后的大国合作中，国民政府更强调中国同美英等大国的平等地位，也因此要求个体展现“大国公民”的风范。1947年，国立编译馆出版的《初级中学公民》为“作为世界重要一份子”的战后青年规划了应具备的“正确的世界观”，即青年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抗战牺牲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要“自信自尊”，不能“自暴自弃”；中国的强大是东亚安定的保障，所以，应该发奋图强早日完成建国工作，从而保障东亚稳定；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一员应与美苏英法等民主国家通力合作保障世界的和平。<sup>①</sup> 公民个体再一次与世界的命运相联，但是，在国民党三民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国家是这个关系中最关键的纽带，也是公民须要服从并为之贡献的最终对象。

## 结 语

1946年，袁公为编写的《中等学校公民科教材及其教学法》总结了公民教育作为“政治工具”所经历的内容变迁。该书认为，君主政治时期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训练“驯良之顺民”，培养其个人道德修养和忠君观念；军阀政治时期的公民教育则因国内政治混乱而“无一定之立场作根据”；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民教育则“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准则，其内容重在三民主义革命理想之培养，目标既较确定，功效自易表现”。<sup>②</sup> 这一概括不可谓不坦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国内理想主义情绪高涨、民族主义日渐炽热，公民教材将个体视为“人

<sup>①</sup> 国立编译馆：《初级中学公民》第3册，上海：世界书局1947年版，第98—99页。

<sup>②</sup> 袁公为：《中等学校公民科教材及其教学法》，第29—30页。

类一份子”，在“国家公民”的基础上，力图培育服务于人类共同福祉的“世界公民”。在战争与革命的洗礼中，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公民课程已经衍生出一套成熟的党义教育的政治模本。三民主义的革命外交理想和行为规范成为架构起公民个体同国家、世界关联的纽带，也是国民政府希望每个公民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现实中挽救中国被压迫命运、扶助其他弱小民族乃至改造世界时用以武装自身的知识武器。向公民普及外交知识也是为国家培育了解国民党党义所描绘的国际现实、并且具有服从精神的革命公民。一个具备外交知识的合格公民，应该是能够利用三民主义武装自身、忠于国民党党义精神、服从领导、遵守纪律的集体中的一员。公民个体对国家和世界的责任也是在此精神指导下构建的。

思想与观念的演变是缓进的，受官方话语指导与社会思潮影响的教材编写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尽管在一个特定时期的教材叙事呈现某种特征，但不同阶段的分野并不是非黑即白般鲜明。在公民教材塑造的个体、国家、世界的关系中，追求大同、放眼人类的世界主义，与立足本土、关注国家命运的国家主义始终是相互交织并行的主题，但从20世纪20—40年代，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思想角力并非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同年代教材的编写也不是对旧教材的彻底抛弃和全新再造。虽然知识界、政府官员、革命政党等不同群体不断向其中增添新的主张和解读，但在改写中也包含继承和延续。可以说，虽然这一时期国际格局与国内政治环境风云变幻，但是，公民教材的外交知识对个体、国家、世界关系的塑造，却在渐进的叙事中发生微妙变化。

孔飞力谈到，自清末以来，中国一直需要协调政治参与的扩大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sup>①</sup>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交民主化浪潮之下国家面临的命题，即如何处理外交大众化与外交专业化之间的关系。将

---

<sup>①</sup> Philip A. 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

党义精神灌输至公民教材对外交知识的介绍中是国民党解决二者矛盾的方式——以增长公民外交知识、提高公民监督和参与外交能力的名义，在公民形成有关个体、国家、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时，从根源上加强了思想控制。因此，外交知识的对内价值并不止于外交民主化理论通常强调的在形式上扩充或保障公民对外交事务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更在于从思想和组织上塑造乃至统一了公民的观念。

在有关个体、国家、世界关系的讨论中，“外交”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平台。外交知识既是教学的具体内容，又是考察衡量公民能力的标准，还是承载党义工具的载体。在公民教材向学生讲述外交的过程中，“内”与“外”的力量是相互交织的。它增添了公民概念的国际维度，也改造了原本属于精英的外交概念。然而，在借公民教育之际传播外交知识和以外交知识培育革命公民二者之间，恐怕后者才是这场国民党主导下的外交知识普及实践的终极目标和本质诉求。